

固守真理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出版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回忆录、研究著作等不知凡几。我个人稍有了解的，是其中两种思想观点互相对立的出版物。一种是篡改史事，颠倒是非，否认、掩饰那场战争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极力淡化军国主义。日本报刊上把这种出版物的思想观点叫做“皇国史观”或“文部省史观”，可谓鲜明扼要。那种史观反映出了人数少、能量大的旧势力的延续与蠢蠢而动。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注视。和这相反的一种思想观点的著作，是站在日本民族先进者的立场上，正视事实，不讳不隐，指出日本发动的是一场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类出版物地位突出，名著不少，一部分早有中译本流传。田中正俊教授的《战争·科学·人》是这类著作中最新的一部。一个民族和个人一样，坦然面对现实，才能具备勇敢精神。在看待中日战争历史的问题上，非常明显，体现了日

* 这是为《战争·科学·人》中文译本撰写的序言。曾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本这个伟大民族勇敢、进取精神的，不是前面那种观点，而是后面这种观点。

《战争·科学·人》思想丰富，论述醒豁。我想可以拈出这样几个字概括它的主旨：关怀民族，固守真理。著者一再强调，我们这些原本不应受到科学真理以外的任何东西所支配的人，如果屈从文部省那种“历史观”，身为历史教育家或研究者，首先就不能负起社会的责任。“无论在任何权力之前，吾人都应固守真理”。书上所有史事叙述，一概是这个主旨的贯彻。关怀民族命运，牢记社会责任，固守科学真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似乎是平常道理，并不新鲜。但是联系中国前一个时期学术理论界的实际来看，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道理太不平常了，以至令人心弦震撼。今年7月间，纽约《中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中国“改革开始不久，整个社会科学界，包括大学的文科教学，简直乱成了一锅粥。那时候，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谩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辞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意识形态和它支持的国家政权对立了。这些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在经济、哲学、文学以至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基础”。^① 我以为《中报》社论道出了事情的实

^① 纽约《中报》1989年7月13日社论：《意识形态领域的惨痛教训》。

质。我们只须说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那种动态，从开始演变到后来严重混乱的局面，是有一个过程的。“时髦理论”主要是诋毁、歪曲马克思主义，鼓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指责现实”则主要是指责中国社会主义，反过去一味地赞美西方资本主义。现在想来，当时不少就社会生活、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发表议论的人，如果不是忘掉社会责任，能够坚持科学态度，不管存在多少认识、观点对立，也肯定不至于闹到扮演起社会不安定促成者的角色。可惜事情并非那样。历史运动、重大事件的根据，最后在社会经济基础、人们的物质生活里面。历史从来不最后取决于意识形态、一些人的灵魂，然而历史又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定的意识形态、人的灵魂。由此可见，《战争·科学·人》所主张的关怀民族，牢记社会责任，固守科学真理这个“平常道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何是一个极不平常、唤人猛省的问题。不消说，科学真理绝非任何人所能够垄断。学术理论领域具体问题的分歧，不可能凭罢黜众家，定于一尊去解决，而必须依靠百家争鸣。在中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主张要坚持的真理，是指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社会主义道路。它们基本的价值观念，就像确认中日战争中日本是侵略的一方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一样。

田中先生在《自序》里说：“谨以本书献给我们的老师刘大年先生”。对于田中先生的高情厚谊我深致感谢之忧。我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整个教学过程是由田

中先生主持的。怎样看待抗日战争，那时大概因为不属于课堂的讲题，谁也没有提出专门讨论过。当然我更不知道面前这位历史学者，曾以一个21岁的青年被作为“学徒兵”驱赶上战场，历尽艰险。今天来读他这部把亲身经历和对那场战争客观冷静分析结合在一起的精到著作，新增加的了解何止限于文字所述。本书上讲的一个核心是“人”——发动战争的人，被迫参加战争或者死亡或者幸运活下来的人，利用科学技术从事活动的人，现在对战争的评价截然相反的人等等。人是社会动物，又不是机械简单的社会动物。书的情节告诉我们，这位历史研究家、教育家是一个主张自己民族也主张别的民族同样要自尊自信的人，是一位在为人师表上高自位置的人，一位敢于顶住强权，固守科学真理的人。